

论弗吉尼亚·伍尔夫 对英国文学疆界的有机建构

高 奋

内容提要：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大量阅读和评论英国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为英国文学疆界作出了有机建构，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在总体形态上，构建以“愉悦”为核心的编年史结构，将文学的超越性和文学的历史性有机结合；在内在构成上，用虚实相映与对比评判的审美方式揭示英国文学的独创性与局限；在特性概括中，以国别文学对照方式提炼出英国文学侧重个性描写和擅长幽默喜剧的特征。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 英国文学 有机性 疆界

中图分类号：G0；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5)05-0132-09

DOI:10.16430/j.cnki.fl.2015.05.016

自 1904 年至 1941 年，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用三十余年时间，不仅评论了从 14 世纪到 20 世纪数百位重要、次要和无名的英国作家，而且出版了两本英国文学批评随笔自选集《普通读者》(I, II)，独具匠心地勾勒出英国文学的疆界。在她的建构中，英国文学是一个有机体：其边界清晰，但又与其他国别文学有着应和关系；其结构自然，内在构成并非由主要作家和重要作品直线串联而成，而是主次交错、多种体裁相关联的存在大链条；其审视深入，既虚实相映又对比评判；其概括中肯，基于大量作家作品分析

和国别文学对照。伍尔夫的有机建构不像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整一律”那般严谨，“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除，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亚里士多德：28)而更接近柯勒律治的有机诗学，“在使相反的、不调和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柯勒律治：69)梳理和揭示她的独特建构，有益于从另一视角整体观照英国文学的边界、内涵和特性。

英美学界侧重从伍尔夫的英国文学随笔中提炼她的批评思想，盖吉特(Guiguet：150—65)、韦勒克(111—41)、戈德曼(Goldman：7—31)等都曾作分析，另外也

关注伍尔夫与其他英国作家之间的传承关系,比如伍尔夫对莎士比亚的阅读,(Schwartz: 721—46)雪莱对伍尔夫的影响(Brown: 182—204)等,但很少有人对伍尔夫的英国文学评论作总体梳理。伍尔夫曾赋予英国文学怎样的编年史框架?她采用了怎样的审美批评模式?她就英国文学的基本特性作出了怎样的归纳?这些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一、以“愉悦”为目的的编年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伍尔夫在自选集《普通读者 I》(1925)和《普通读者 II》(1932)中,按年代顺序编排自14世纪至20世纪的英国文学随笔,其中一本穿插了评论古希腊、法国和俄罗斯文学的三篇随笔,以独特方式呈现她对英国文学疆界的领悟和建构。其自选集的选编宗旨是“愉悦”,而编写体例则是“编年史”,她的有机观念正是通过将“愉悦”说和“编年史”所代表的不同文学批评立场相结合而传递的。

在《普通读者 I》的序言中,伍尔夫借助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的话语,阐明了她以“愉悦”为目的的编排宗旨:

在约翰逊博士心目中,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受教育的程度没那么高,天赋也没那么高。他阅读是为了自己的愉悦,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他受本能的牵引,要凭借自己所了解的一鳞半爪来创造一个整体——某个人物的画像、一个时代的勾勒、一种艺术创作理论。(1994: 19)

在这里,伍尔夫以“愉悦”作为阅读的宗旨,其观点类似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盛行的愉悦说,比如德莱顿(John Dryden)的

“愉悦如果不是诗歌的唯一目的,也是主要目的”,(100)约翰逊的“只有对一般自然的再现才能给人以愉悦,才能使愉悦恒久”。(1908: 11)所不同的是,新古典主义的愉悦说重在阐明文学的教益作用,将文学视为“在读者那里实现某种效果的工具”,以“教益、情感和愉悦”为效果的具体表现;(艾布拉姆斯: 7)而伍尔夫的“愉悦”强调文学阅读中普通读者自主领悟的重要性,文学批评是“遵循自己的直觉,运用自己的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过程。(1959: 258)

不过,在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上,伍尔夫与新古典主义的立场大致相同,那就是,文学在本质上是对人的本性的描写,它是超越特定历史形态的。约翰逊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立场:

诗人的本性要求他评估所有的幸与不幸,观察激情在不同情境下的力量,追踪心灵在不同的制度和气候、风俗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他必须消除自己的年龄和地域带来的偏见,他必须在抽象和不变的心境中思考是非问题,他必须抛开现行的法律和舆论,去探寻一般的和超验的真谛。(1988: 9)

约翰逊关于文学揭示人性和文学超越自我、国家和历史的理解,正是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中反复申明的。她不仅声称其“愉悦”说源自约翰逊,而且从读者角度重构了约翰逊的文学本质说:读者的任务是去追踪并领悟作者对一个人、一个时代、一种文论的描写,沟通的媒介是读者和作者共通的本能和天性。她几乎在所选的每一篇随笔中都追踪并揭示:作家作品是否超越历史事实,去表现“更高超的抽象表达,走向虚构艺术更纯真的真义”。(1959: 264)

但是,她的随笔体例却采用了“编年

史”这一特别强调历史主义精神的模式。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普通读者 I》的目录列出:

帕斯顿一家和乔叟——论不懂古希腊文学——伊丽莎白时代的库房——伊丽莎白时代戏剧读后感——蒙田——纽卡斯尔公爵夫人——漫谈伊夫林——笛福——艾迪生——无名者的生活——简·奥斯丁——现代小说——《简爱》与《呼啸山庄》——乔治·爱略特——俄罗斯视角——论四位无名作者——赞助人与藏红花(笔者注: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现代散文——康拉德——论当代作家

从中可以看出伍尔夫编目的三大特点:

(一)按照年代顺序编排从 14 世纪乔叟到 20 世纪康拉德等作家的随笔。但是她选择作家的标准不像常规编年史那样以作家作品的崇高性、代表性、原创性、影响力为依据,^①以线性的方式串联各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她的选目是多元的,串联是曲线的,既包括重要作家,如乔叟、笛福、简·奥斯丁、乔治·爱略特、康拉德等,也包括次要和无名作者,如伊丽莎白时代作家群、伊夫林、艾迪生、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等;

(二)所选体裁是多样的,小说、戏剧、诗歌、书信、日记、传记、理论等杂乱汇集;

(三)在英国文学为主体的编年史中,穿插古希腊、法国、俄罗斯文学。

相对于常规编年史而言,除了“按照所探讨的作者的年代顺序编排目次”(韦勒克:131)之外,它看起来既不完整又不规范。这一非常规编年史体例,究竟是传承还是颠覆了文学编年史的初衷,值得探讨。

以编年方式构建国别文学史的做法始于 19 世纪,其基础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在民族文化即民族精神

的表现和自然科学是最可靠的研究方法等思想的影响下,自 19 世纪中后期起,文学史家们纷纷按年代顺序建构文学史,以诠释文学史即时代精神的构成、表现和发展的观念。(蒂博代:194)泰纳(H. A. Taine)关于文艺创作及其发展史受制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的观点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

在每一种情形下,人类历史的机制都是相同的。人们不断发现精神和灵魂某种最原初的普遍特性,它是内在的,由自然附加于某种族身上,或者说它是由于环境作用于种族而获得或产生的……有三种不同的原因有助于产生这种基本的道德形态——种族、环境和时代。(423—24)

因此,“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貌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原因。”(泰纳:7—8)可以看出,文学编年史的基本立场是:将文学史等同于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演化史;认定文学的发展取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混淆文学批评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忽视文学自身的本质、规律和价值。

伍尔夫采用了编年史体例,但仅仅接受了文学与历史相关联的观点,并不接受文学取决于历史的立场。她将“愉悦”说与“编年史”体例合一,结果产生了独特的“有机发展整体”。(Guiguet:156)其有机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相信文学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其宗旨在于揭示人类天性;国别文学对比更

^①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中提出这几条经典评判依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学界对编年史选材标准的共识。

能有效地显现英国文学的独特性。

《普通读者 I》中有三对醒目的国别文学对比:作为欧洲文学源头的古希腊文学与作为英国文学源头的乔叟作品的对比;法国蒙田的随笔与同时代的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文学的对比,19 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与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英国近现代作家的对比。这些对比显然是有意而为之,旨在让人明辨英国文学的优劣。伍尔夫在论述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时曾明确论述这一用意:

伊丽莎白时代的散文如何不适用,法国散文如何已自足,通过对比锡德尼的《诗辩》与蒙田的随笔即可明了……锡德尼的散文是绵绵不绝的独白……但它长篇累牍,既不活泼也不口语化,不能牢牢抓住其思想……与此相比,蒙田则擅长行文,了解文体的力量与局限,能巧妙地进入连诗歌都无法达到的情感缝隙……(1994:57)

与这段引文相呼应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随笔与蒙田的随笔在编目上前后相联。类似的国别文学对比性论述在自选集中反复出现,英国作家作品的特性大都是在英、法、俄多种文学对比中提炼出来的。

(二)文学发展与人类历史发展相互呼应,因而将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并置,更能显现伟大作家的艺术独创性和思想深度。

在自选集目录中,伍尔夫将各时期的主要作家与次要、无名作家并置,有意建构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相对照的格局。生活真实大都通过评点不知名作者的日记、传记、作品来勾勒,它们只提供事实,远未达到揭示人性的深度;艺术虚构通过分析经典作家作品来揭示,它们实现了更为高超的抽象,能够表现精神和本质。(1959:264)英国文学的技巧、风格、主题、意境都

是通过现实与虚构的比照来揭示的,而不是通过理性的归类、鉴赏和解释来完成。

这种对比有时直接应用在单篇随笔中。比如在《帕斯顿一家和乔叟》中,实有其人的英国帕斯顿家族的日记所描绘的14、15 世纪的真实生活,与同时代作家乔叟的文学虚构相映成趣。这种对比更多体现在上下篇目的呼应之中。比如18 世纪的社会特性提炼于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家书(1994:410—17)、伍德福德的日记(2009:417—23)和沃尔浦尔的书信中(1958:181—86),所对应的是18 世纪作家笛福和斯特恩的伟大作品。

这种编排方式,对伍尔夫来说颇有情趣,是走近著名作家的一种方式:

传记作品和回忆录……为我们点亮了无数这样的房间,展现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磨难、失败、成功、饮食起居、爱恨情仇,直至死亡……通过它们来照亮过去时代的许多窗口,从他们的日常习惯中认识那些故去的著名人士,甚至在想象中走近他们……(1959:261—62)

可以看出,在对待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的问题上,伍尔夫既不像泰纳那样只预设历史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也不像约翰逊那样只预设文学对历史的超越性,倒像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论述的那样,“假定价值观或艺术作品可以在不参照它们得以表现的特定社会状况下就进行充分研究,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假定社会解释是决定性的,或者说价值观与艺术作品不过是副产品,这种看法同样是错误的”,重要的不是去预设哪一种具有“先在性”,而是去关注“它们本身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61—62)伍尔夫在编目上将不同层次、体裁、国别的作家作品按

照年代顺序编排,所呈现的只是一种并置或对照关系,其中并无人为预设的先在和决定性观念。她的主观评判只应用于单篇随笔之中,只应用于作家作品与真实生活的具体对比之后,从不会用它先在地统管整个系统。正是这种随意而开放的建构,将文学本质的超越性与文学结构的历史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伍尔夫的编目是有机的,其有机性就体现在它的平淡自然上,看起来就如真实的自然界那般繁杂、凌乱、无序,因为真正的凝聚力是超然其外的。她对英国文学疆界的有机建构非常接近她最推崇的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对“想象”的有机性的描述:“它调和同一的和殊异的、一般的和具体的、概念和形象、个别的和有代表性的、新奇与新鲜之感和陈旧与熟悉的事物……并且当它把天然的与人工的混合而使之和谐时,它仍然使艺术从属于自然;使形象从属于内容……”(69)在伍尔夫所建构的英国文学有机疆界中,唯一的内在机制是对比:虚实对比、内外比照和异同并置,其中并无人为预设的逻辑、假说和推论。

二、虚实相映与对比评判 并重的批评模式

与虚实对照的编年史体例一致,伍尔夫几乎在每一篇随笔中都采用了虚实相映与对比评判并重的批评模式,即:将作家作品置于真实的时代背景中予以全景观照,并通过同类作品对比对其作出评判,以揭示英国作家的独创性和局限。这一批评模式的重要性体现在下面两点上:

首先,虚实相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阐明真实生活对艺术虚构的影响力,恰恰相反,它是为了探明艺术虚构在多大程度上

超越了生活真实。对伍尔夫来说,批评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作为个体的人演绎作为作家的创作者?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拒绝或接受作为个体的作者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同情之心和厌恶之情……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如此个人化的事件中受偏见的引导更致命的了。(1959:263)

也就是说,批评家只有看清了作为作家的创作者在多大程度上高于作为个体的人,他才能把握该作家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个人经历和生活事实的遮蔽,以一种更高超的艺术抽象去表现“人性中虽不是最诱人却是最恒久的东西”(1994:104)或“琐碎的生活场景之下最持久的生命形式”。(149)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批评既不像克罗南伯杰(Lows Kronenberger)所评的那样,只“记录了心灵在志趣相投的经典作品中的历险记”,(103)也不像戈德曼所总结的那样,表达了“作者的现实观决定他的审美信念和内容形式”(10)的信念,她的目标是去揭示作家在虚构艺术中对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超越性。

其次,在虚实对照的基础上实现对作品的充分感受和整体观照后,批评家必须依托自己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学识”对作品进行充分的“对比和评判”。这个阶段的对比是在同类书籍之间进行的,批评家需要做的是将所评作品与“同类中最杰出的作品进行比较”,(Woolf, 1959:267)以使用相关的伟大思想照亮“我们心灵深处不断翻滚的模糊念头”。(269)这是一种全景视野,它将作家作品置于整个艺术史领域中进行审视和判断,以超越批评家的个人喜好或单一理论的偏狭。

她用这一批评模式洞见了英国伟大作

家的原创性和超然性,比如乔叟、多恩等。

在评论 14 世纪乔叟的作品时,伍尔夫基于真实的帕斯顿家族的书信,描绘了 14、15 世纪英国家族的生存图景。在两代人生活描写的中间地带,她插入了对乔叟诗作的评论,以现实真实与文学虚构相比照的方式,阐明了乔叟的原创特性:其一,中世纪生活的简朴和单调,与自然环境的荒凉和原始,造就了乔叟直观、欢快、明确的诗歌风格。他的创作是对严酷生活的一种逃离。“在乔叟眼里,乡野太宽广、太荒凉,并不怡人。他仿佛已体验过这种痛苦,本能地回避风暴与岩石,转向五月天和明快的景致;回避严酷和神秘,转向欢乐和确定。”(1994:27)其二,基于这一本能的审美取向,乔叟的诗作在措辞的简朴和人物的平实上与当时的简单生活形态与严酷环境相符,在基调的明快和主题的诗意上高于现实生活。“它是诗歌的世界。这里的一切比日常世界或散文更快、更强烈、更有序……”(32)伍尔夫指出,在艺术技巧上,乔叟的优势显著:在自然描写上,他的技法高于华兹华斯、丁尼生;在人物活力的塑造上,唯有康拉德可以与他媲美;在幽默营造上,他比笛福、斯特恩、乔伊斯更自如。他的诗作的最大优势在于赋予单调无趣的日常生活以诗意、幽默和快乐。

在评论乔叟诗作时,伍尔夫既没有复述乔叟的意识,也没有用生活真实来评判他的作品的真实性,而是在现实的严酷、单调、无趣与乔叟诗作的欢快、明确、诗意的对比中,突显乔叟的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特性与价值;进而在对比乔叟与其他英国名家中,显现他的原创技巧之高超。

伍尔夫认为约翰·多恩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将纷繁复杂的事物融为一体,并予以

有力表现。她将他与莎士比亚并列,赞扬他能够超然于一切自我意识、性别意识和道德评判之上,自如地表现纷繁复杂的世界的本来面目。“在他晦涩的思想中某些东西让我们痴迷;他的愤怒灼人,却又能激发情感;在他茂密的荆棘丛中,我们可以瞥见最高的天堂之境、最热烈的狂喜和最纯粹的宁静。”(1988:463) 她认为多恩的诗歌有一种与伊丽莎白时代文学迥然不同的品质,那就是,将“那些原来分散在生活河流中的元素……变成一个整体”(2009:350) 的力量。与伊丽莎白时期作家们偏爱拔高、综合和美化的审美取向相反,他喜欢精确描写细节,喜欢将相互矛盾的生活场景并置,喜欢将人物内心格格不入的欲望聚合,充分表现了生命和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审美取向赋予他的诗歌以极强的生命力、深刻性和超然性。

对比评判显然是上述评论中最锐利的武器,不仅助她明辨艺术对生活的超越,而且明辨作家的独创性。她也常常用这一方法照见作家的局限,阐明他们的问题在于无法超越生活事实,比如伊丽莎白时代作家群。她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就像一片“丛林和荒野”。(1994:62) 戏剧家们沉浸在对独角兽、珠宝商、神秘岛和热那亚宫殿的幻想之中,远离现实生活,其描述完全不靠谱,“他们不是停留在现实生活上空某处,而是一直飞升至九霄之外,在那里长时间只看见云彩聚散”。(63) 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和散文清新、鲜活而优美,却不能“朴实而自然地谈论普通事物”。(2009:335) 它用词夸张华丽,只关注奇思妙想,语言空泛冗长,不能触及活生生的人。与同时期法国作家蒙田的作品相比,英国的诗歌散文缺乏形式的活泼、思想的准确和风

格的微妙,它的幽默和想象尚不成形。(1994:57)锡德尼的《阿卡迪亚》就是例证。这个纯粹的幻想故事,遵循该时期的创作程式,让王子公主游列在神奇的国土上,语言抽象,场景优美,人物无瑕,但作品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斯宾塞的《仙后》同样是幻想故事,用恶龙、骑士、魔术及黎明、落日编织而成。它的语言是高雅和世俗的混合体;它的人物尚不定型。

在评点伊丽莎白时期文学时,伍尔夫将生活与艺术相对照、同类作品相对比的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只是这一次她指出的是,不论文学虚构被生活事实淹没,还是它完全脱离了生活真实,文学的活力都将荡然无存。

总之,伍尔夫之所以能敏锐地洞见英国文学内在构成中的独创性与不足,是因为她始终以生活真实为参照,进行同类书籍对比评判,最终揭示文学虚构的超越性之所在。她的批评与圣伯夫的传记式批评、泰纳的社会环境式批评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后者就如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从不曾注意到作家在作品中的“自我”与他在真实生活中的“自我”是完全不同的,(65)他们在批评中总是用生活真实去捆绑文学虚构,结果只会让文学窒息;而伍尔夫则自始至终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总是在比照两者的不同中揭示文学虚构的价值与局限。

三、英国文学的特性

伍尔夫对英国文学疆域的概括是在国别文学对比基础上给出的。她在对照俄国文学的“灵魂”的博大、完整和深刻的同时,概括出英国小说的基本特色是:“从斯特恩

到梅瑞狄斯的英国小说都证明,我们对幽默和喜剧、尘世之美、知性活动和身体之美妙有着天然的喜爱。”(1994:163)她在比照法国作家笔下那些富有“人性”的人物塑造时,指出英国作家擅长表现人物的“古怪形貌和举止,她身上的纽扣和额头的皱纹,头发上的丝带和脸上的粉刺。她的个性主宰着全书。”(1978:102)这两段描述从神和形两个方面概括了英国文学的一般特性,它们的共通点在于,将英国文学的一般特性指向幽默的“个性”。这一特性虽然是在比照俄国文学的深刻“灵魂”和法国文学的和谐“人性”之时概括出来的,它的基础却是伍尔夫对英国作家作品的大量评论。

伍尔夫特别欣赏用开阔场景中的鲜活“个性”人物来构建尘世之美的英国小说家,比如笛福、哈代。她认为笛福是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总是将人物置于孤立无援的绝境,用亲身经历和参悟熔铸人物的血与肉,“他似乎把他的人物深深记在心中,能够以他自己也不完全清楚的方式体验他们”;他着重表现人物的“勇气、机智和诚实”等人性中最真实最根本的东西,“他达到了一种洞察的真实,这比他自称的事实真实要珍贵得多,也持久得多”;(1994:102—03)他坚持独特的透视法,始终顺着人物的目光看世界,构建世界;他只关注“现实、事实和本质”(1958:379)这只尘世“大瓦罐”,平铺直叙地描绘事实,实事求是地观察世界,一切都是为了表现纯粹的“尘世”之美。最终他让普普通通的劳作变成了美的艺术:“由于坚定地相信那只瓦罐的硬度及品质,他让所有其他元素都服从于他的设计;他将整个宇宙融为一体。”(381)她认为哈代拥有“惟有他才享有的举世公认的崇高地位”。(2009:561)她从他

谦逊诚实的品性、恬淡诗意的态度和博览群书的视野出发,整体观照他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指出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始终用大自然来映照人的命运,而不是将视野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他意识到大自然蕴含着一种精神,它对人类的命运或同情或嘲讽或无动于衷,因此他“不曾将光芒直接投射到人的心灵上,而是越过人心将光芒照射在石楠荒原的黑暗中或狂风中摇曳的大树上”,⁽⁵⁶⁷⁾让我们从人物对大地、风暴和四季的敏锐感受中读懂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生命力。他的人物既是“受自己的激情和癖好驱使的普通人”,又具有“与我们心灵相通的象征意味”。⁽⁵⁶⁶⁾他最好的作品是用“瞬间幻象”来表现的,而不是用说理来阐明的,因此能带给读者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哈代带给我们的不是某时某刻的生活摹写,而是整个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景象,它是用强大的想象力、深刻的诗意才华和充满仁爱的心灵来表现的。”⁽⁵⁷¹⁾

她高度赞扬那些以幽默的人物“个性”来构建英国文学中最令人愉悦的作品的小说家,比如简·奥斯丁。她盛赞简·奥斯丁能够赋予琐碎的生活场景以“最持久的生命形式”。^(1994:149)她认为奥斯丁幽默、独立和深思的个性和有限的生活圈决定了她聚焦人物性格、生活场景和反讽基调的艺术特性。奥斯丁既擅长用曲折的对话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完整性,“那种难以捉摸的性质是由许多很不相同的部分组成的,需要特殊的天才才能将它们融为一体”;⁽¹⁵¹⁾也擅长用微妙的、对比的场景显现尘世生活的深度、美感和活力,“在琐碎和平凡中,他们的话语突然充满了意义,这一刻成为两个人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光”;

最重要的是,奥斯丁能从心而发去塑造人物“个性”的真善美,“她用无过失的心灵、无懈可击的品味、近乎严厉的道德作为参照,映照那些偏离了善、真和诚的言行,呈现了英国文学中最令人愉悦的描写。”⁽¹⁵²⁾

由于论文篇幅的限制,我们的实例分析挂一漏万,不过可以看出,她对英国小说特性的概括是基于评论之上的提炼,而不是一种预设。无论是笛福、哈代等对人在自然中的活动的描绘,还是简·奥斯丁等对人在社会中的活动的刻画,英国小说的基本场景就在尘世之中,表现着知性的和身体的活动,秉承了乔叟以来的幽默性和喜剧性。

伍尔夫所建构的英国文学疆界是独特的。它不像常见的国别文学疆界那样,按照预设标准进行严格选择,按照逻辑性或历史性建构封闭体系,具有鲜明的统一性、恒定性、排他性、二元对立等特征,就比如利维斯用独创性和道德关怀等标准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浓缩在少数几个作家身上。^(利维斯:1)她只是从文学表现人性这个原点出发,兼容了文学的超越性与历史性、真实与虚构、重要与次要、一般与特殊、伟大与缺陷、恒常与变化、内与外、同与异等多种对立元素。其实在她看似无序的编目之下,隐藏着她对英国文学疆界不断向外向内拓展的动态发展历程的揭示,即从乔叟对“生活”的幽默直观描写,到锡德尼和斯宾塞对“身体活动”的无边幻想,到多恩对“自我心理”的探索,到笛福对“现实和人性”的把握,到简·奥斯丁对“情感思想”的刻画,直至哈代对“生命”的表现。当然,她只是将感知英国文学疆界的广度和深度的自由空间留给了读者,而没有给出直白

的概括。



参考文献:

1. Brown, Nathaniel. "The 'Double Soul': Virginia Woolf, Shelley and Androgyny." *Keats-Shelley Journal*. 33. (1984):182-204.
2. Dryden, John. "Of Dramatic Poesy: An Essay." *Essays*. Vol. 1. Ed. W. P. Ker. Oxford: Clarendon, 1900.
3. Goldman, Mark. *The Reader's Art: Virginia Woolf as Literary Critic*. The Hague: Mouton, 1976.
4. Guiguet, Jean. *Virginia Woolf and Her Works*. Trans. Jean Stewart. London: Hogarth, 1965.
5. Johnson, Samuel. "The History of Rasselas."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Ed. Raman Selden. Essex: Longman, 1988.
6. —. "Preface to Shakespeare." *Johnson on Shakespeare*. Ed. Walter Raleigh. Oxford: Henry Frowde, 1908.
7. Kronenberger, Louis. "Virginia Woolf as Critic." *Virginia Woolf: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1. Ed. Eleanor McNeen. Mountfield: Helm, 1994.
8. Schwartz, Beth C. "Thinking Back Through Our Mother: Virginia Woolf Reads Shakespeare." *ELH* 58.3 (1991):721-46.
9. Taine, H.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Ed. Raman Selden. Essex: Longman, 1988.
10.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11. Woolf, Virginia. *The Captain's Death Bed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arcourt, 1978.
12. —. *The Common Reader. Second Series*. London: Hogarth, 1959.
13. —.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Vol. 3. Ed. Andrew McNeillie. London: Hogarth, 1988.
14. —.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Vol. 4. Ed. Andrew McNeillie. London: Hogarth, 1994.
15. —.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Vol. 5. Ed. Stuart N. Clarke. London: Hogarth, 2009.
16. —.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Vol. 6. Ed. Stuart N. Clarke. London: Hogarth, 2011.
17. —. *Granite and Rainbow: Essays*. London: Harcourt, 1958.
18. 艾布拉姆斯:《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赵毅衡、周劲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9. 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0. 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21. 柯勒律治:《文学生涯》,载刘若端等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2.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23. 普鲁斯特:《驳圣伯夫》,王道乾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24. 泰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5.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6. 亚里士多德:《诗学》,载《诗学·诗艺》。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09BWW019)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a metamorphosis from internality to externality in terms of its definition and criterion, and “manliness” was supplanted by “masculinity” which was more in line with the tastes of modern people. Because its emphasis on such elements as power, wealth, and sexual potency, masculinity is no longer a spiritual power for people to confront fear and pressure, but the source of anxiety and pressure. Al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asculinity crisis and the declining of the theoretical creativity of masculinity studies, since the 1990s, a humanistic turn has surfaced in men’s studies, and the concept of “manliness”, which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began to be revalued in this turn. Along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arvey Mansfield’s name-giving work of manliness—*Manliness*—in 2006, the academic status of “manliness” has been firmly established, and become another important key word after “masculinity” in men’s studies. This paper endeavors to carry ou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is key word’s nature, value orientation, criterion,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aesthetic value from such four aspects as the discriminat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related to manlines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manlines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defini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manliness, and the tradition of manliness writing in literature and its poetic features.

GAO Fen Virginia Woolf’s 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c Boundary of British Literature 132

Based on her comprehensive review, Virginia Woolf constructed an organic boundary for British literature, which includes three aspects: in terms of form, it is of chronologic structure with “pleasure” as its core, for the purpose of unifying its literary transcendence with literary historicism; in terms of its formation, it discloses originality and defects of British literature through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fictional and among different books; in terms of characteristics, it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of British literature as character writing, humor and comedy through a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literatures.

YANG Jin Love Letters between Communication Medium and Literary Reproduction: On Gottfried Keller’s Novella *Abused Love Letters* 141

Swiss writer Gottfried Keller’s novella *Abused Love Letters* reveals the multiple manipulative operations of love letters and the scandal thereof. The process of how the true and false love letters written through different motives effectually construct or deconstruct the emotional bond in the age of overflowing printed texts can be illustrated from five perspectives of love letters, namely, writing motive (spatial distance), emotive reason (expression of feelings), semantic information (utterances of love), intimacy (you-and-me setup) and efficacy (exchange of feelings).

WANG Liya What Is “New Formalism”? : A Review Essay on *New Formalisms and Literary Theory* 149

Of those many “turns” and “returns” in the post-theory period, “New Formalism” attracts the least attention for its ambivalence about its theoretical paternity. With its obvious lineage from New Criticism, Russian formalism, and Chicago School, New Formalism was debunked in the late 1990s as backlash formalism but reclaimed in the recent years as a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prevalent New Historicism and calls for a return to the aesthetics. To understand the movement and reveal its subsequent consequences, this review essay looks into the main critical consensus delineated in the collection *New Formalisms and Literary Theory* (2013). Echo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New Formalism?” recurring in the collection, this essay re-examines the different answers in the scholarship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ual readings of literary forms, revealing the lucrative and hybrid nature of New Formalism(s).